

新观察

鲜为人知的近现代中国科幻生态图景

■杨枫

影像类的相关资料同样引人注目。从观众反响看，早期科幻电影在当时已具备强烈的奇观效应，新片上映往往万人空巷；而专业文化人则多持批判态度，认为这些作品借助先进技术，却仍沉溺于玄奇怪异的旧套。在民族危机与日本侵华的背景下，电影审查制度逐步确立，但其中也不乏令人困惑的个案：如改编自史蒂文森名作的《化身博士》久未过审，而殖民视角更为露骨的《兽世界》却率先上映。大量影评提及当时流行的“兽片”，并围绕其展开讨论。与之相比，超级英雄电影在上海的放映反倒不显新鲜，甚至出现《沙赞》（原子飞金刚）早于《超人》（无敌飞天侠）上映的情况。这些影片多集中于大都会放映，其间节点又与日本侵华战争高度重叠，在文化消费的繁华与时代苦难之间形成耐人寻味的张力。

将副文本纳入文学史的讨论范围，意味着研究重心从“知人论世”式的文本阐释，转向对文化生态与观念流变的考察。在此，文本不再只是审美对象，而成为社会思潮与叙事力量的载体。这一研究路径对于近现代中国科幻尤为关键。自清末至1949年这一阶段，科幻作为一种文类尚未定型，类型边界模糊，创作者多为译者、报人或跨界写作者，难以形成文学潮流或稳定阵地。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，副文本反而成为连接早期科幻与社会各方的重要纽带，使我们得以理解当时社会如何认识“科学小说”“理想小说”，以及来自海外的科幻影像等。

正是在这一意义上，贾立元编著的《近现代中国科幻理论资料（1891—1949）》（下文简称《资料》）显得尤为特别。该书系统收录了1891年至1949年间与科幻相关的论文、序跋、发刊词、编者按、读者来信、杂评、广告、书信、日记，以及个别作品的片段与批语，刻意不收“正文”，从而凸显编辑、营销者与读者等群体的话语位置。这一选择不仅避免了赘述既有文学史的种种话语构建，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此前难以见到的、去中心化的早期科幻生态全景。

作为对该领域有充分研究兴趣的读者，我通读该书最直接的动力在于：想知道当时那些并非后来意义上的“科幻迷”或“科幻作家”的人，究竟如何理解和谈论科幻。这种问题意识本身或许带有某种后设的错位——毕竟在那个时代，即便在英语世界，人们也远未形成有关科幻的共识，更不存在类似今日“科幻圈”的作家群落。然而，正是这种尚未被层层叙事固化的历史，使书中呈现出那个时代面貌具有强烈的陌生化效果，也让我们意识到：熟悉的“边缘人叙事”，恰恰是后世建构出来的。

这种去类型化的状态，首先体现在人物构成上。由于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“科幻作家”身份，当时的创作者背景呈现出惊人的多样性。例如，法裔传教士雷鸣远以口述方式创作《花甲春秋》，由《益世报》的同事兼好友董都青执笔成文；徐迟在以报告文学作家身份为人熟知之前，于1937年创作了科学小说《三大都会的毁灭》；《从月球到火星》的作者姜容樵是著名武术家，开设武馆并系统调查中国武术理论……这些履历的并置，本身就构成了对“科幻作者”队伍丰富性的阐释，也是创作者积极参与文化输出的有力线索。

声音

近年来，随着中国科幻产业的蓬勃发展，“科幻创意写作”也成为备受关注的领域。作为一名科幻作家、研究者和高校教师，我想分享一下自己近年来的一些教学实践和思考。

我于2004年发表第一篇科幻小说。2010年前后，在懵懂新时期，我开始围绕“科幻写作怎样教、怎样学”的问题展开初步探索。2014年，我博士毕业后进入西安交通大学中文系工作，在学校里陆续开设了《科幻与想象力》《创意写作》等课程。2024年，我发表了论文《科幻写作教学的三个要素——兼论“科幻”与“文学”的关系》，这既是对过往教学经验的总结，也尝试勾勒我近年来的教学思考，即“科幻”不仅仅是一种大众文化类型，更可以作为一种阅读、思考和写作的方法，在更加广阔的社会领域中发挥积极作用。我尝试呼吁一种打破纯文学与类型文学、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、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壁垒的写作范畴。我将其命名为“科技人文写作”。

围绕这个新概念，我的工作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2025年，我开设了一门新的本科生通识课程《科技人文写作》。2026年3月，西安交通大学中文系将“科技人文写作”定为重点发展的学科方向之一。从写科幻到教科幻，再到筹划和建设“科技人文写作”教育教学体系，这是一条充满未知和挑战的道路。

目前为止，我遇到的挑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

方面。首先，是“写什么”的问题。从文体上来说，“科技人文写作”划分为虚构和非虚构两大类。虚构包括小说、戏剧、影视剧本、游戏脚本等文体。与之相对，非虚构包括科技人物报道、科技评论、科技访谈、科技史等类别，通常被归入“科普”或者“科技传播”的范畴之下。目前已开设的《科技人文写作》通识课，以提升本科生的基础写作能力为目标，主要训练学生写应用性较强的非虚构文体，如科技人物和科技事件报道等。而正在建设中的专业硕士培养方案，则会更强调“创意”的培养。

其次，是授课对象的学科背景问题。“科技人文写作”具有很强的跨学科特征，适合作为通识类课程，面向各个专业的学生开放。当前，国家科普战略的核心需求是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科普队伍。我们所做的工作正是面向这样的需求，不仅要提升理工科学生的写作与表达能力，更希望从中选拔和培养优秀的科普人才。

再次，是课程如何设计。目前我所设计的教学大纲主要分为两部分。第一部分是选题、文献阅读和综述，第二部分包括采访、调研、终稿撰写和修改。目前，这门课的教学团队以理工科而非中文系青年教师为主。他们在撰写科技论文方面经验丰富，但对于第二部分的写作则普遍存在一些困难。这也意味着，我们的教师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和学生一起探索和成长。

最后，是如何理解“科技人文写作”中“科技”和“人文”的关系。举一个例子：课上有一位学生想写自己的外公，因为他的外公是一位医生，同时也喜爱书法。她觉得这样就能体现“科技人文”理念。在我看来，这种将“科技”与“人文”视作天然彼此分隔的“两种文化”是很典型的思维，但我们很少去探究这种分隔是如何发生的。当下的科技乃至各个学科的发展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理逻辑和数学建模，换句话说，是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转化为计算机能够处理的“可计算问题”。然而，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是“可计算问题”。那些在把“不可计算问题”转化为“可计算问题”的过程中被简化掉的要素，就成为人文学科必须要面对的对象。

举一个来自于数字人文领域的具体例子。重庆大学副教授刘洋在《女性具有更细腻的情感叙事吗？——基于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情感计算研究》一文中，采用情感计算的方法对科幻文本做量化分析。文章提出，就整体而言，中国当代科幻作家在情感叙事上并未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，此观点试图挑战“女性作家的情感书写比男性更细腻”这一广为流传的普遍性论断。我注意到，在这种分析框架下，我的小说《童童的夏天》被认为“情感丰富度”和“情感曲折度”都较弱的作品。然而，这又是一篇被许多读者评价为“感人”的小说。《童童的夏天》通过儿童视角，写



“科幻的中国性”议题也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呼应。

四

值得关注的是，彼时的困惑更多源于古典传统与新潮观念的交汇和反差。在“同为异常想象，为何玄奇不若科学更能打动人心”的问题下，亦有像《新西游记》这样的作品试图将古典和现代予以融合。回首科幻史，这种思考曾因种种原因出现过断层，现如今，既然“中国式科幻”的相关讨论再次重返舞台中央，也许有必要重拾相关讨论。

回到《资料》所展现的整体图景，可以说，科幻在当时既未成型，却也远非地下小众的孤立实践。它出现在战区报纸上鼓舞士气，会成为殖民话语的工具，会被读者追捧或辱骂，会抄袭、断更，也会在批评声中继续被世人消费。名士的跨国接力、女性的参与、大众的热情与抵触，共同构成了一种无主体、去中心化的繁荣。这种状态与当下科幻领域的阵地化和主体地位形成了鲜明对照。

由于科幻的边界高度可塑，这种去中心化的生态繁荣背后所蕴含的观念流动，以及跨越文化的发展差异，还会左右时人对科幻本身的判定。一些在当时已属成熟技术的概念，如潜艇、飞艇、磁场或催眠术，在国内的落后语境中仍会被视为幻想。此外，从后人的视角出发，《资料》所形塑的整套文化环境还会和今日遥相呼应，形成跨时代的互动——背靠200余年的发展和全球各国、各民族科幻话语之交融，当下，科幻已是一个大熔炉，和奇幻、恐怖、推理，和魔幻现实主义、超现实主义、后现代主义等都有交集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当我们一部作品纳入科幻领域时，势必也会将其背后的整条发展脉络归入其中。带着这种后之视今的角度，我们得以进一步拓宽当时的科幻版图，并透过这种持续性的开拓，不断刷新对当时的认识。本文成文时，《资料》中所涉文献记录已被整合至中文科幻数据库中，由是，现当代的种种科幻作品也将成为近现代中国科幻的副文本。这是一张不断更新换代的多维领域地图。至于后人会利用它行至何处，看到怎样的风景，有何种体验，又进一步发现哪些新的路径、新的疆土，就留待这个领域的旅行者们去探索、去发现。

（作者系科幻书评人，中文科幻数据库联合创始人）

如何面对生命的“不可计算问题”

——“科技人文写作”浅思

■王瑶

新技术进入家庭之后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。这篇小说最初是为献给我去世的外公而写的，携带着强烈的个人经验与情感。在写作时，我运用了汪曾祺的小说技法，希望呈现的是一种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的艺术效果。那么，类似于这样的情感呈现，能否在论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中得到有效的评估？类似这些问题都是“科技人文”要回应的问题。

我想再分享另一个具体的写作案例。2025年11月，杨振宁去世的时候，我应邀写一篇稿子，并将其录制成音频课。在拟定写作提纲时找到了两个点，这是其他报道中较少提及，同时也是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，具有很强的“科技人文”意味。第一个是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提出的“宇称不守恒”定律，对于青少年可以带来怎样的启发。我将其与哥白尼的“日心说”放在一起，用“科学革命”和“范式转移”来进行解释，并进一步说明“怀疑常识”为什么那么难，却又那么重要。鲁迅说：“从来如此，便对么？”无论在科技、人文领域还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都应该鼓励勇于质疑的精神。

第二个是杨振宁本人经常会提到的“taste”，通常译作“品味”。杨振宁本人怎么理解这个词呢？1982年，他与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倪光炯访谈时分享了一个故事：“在最近几年之内，我们学校里有过好几个非常年轻、聪明的学生，其中有一位到我们这儿来请求进研究院，那时他

综述

近年来，“全球南方”在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领域日益成为高频热词。全球南方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或经济范畴，而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于相似历史境遇、现实发展阶段、共同发展目标等形成的身份认同。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，全球南方在推动国际秩序发展演变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与此同时，全球南方也凭借自身丰富的内涵与强烈的批判解构力度，被用以研究国家、民族、区域共同体在全球治理、科技发展、文化格局与知识体系等领域存在的平等、不平衡问题。这一概念的使用逐渐延伸至人文研究领域。2025年，“全球南方”入选由《文艺报》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评选的年度文学理论评论高频词。

日前，在由南京大学前沿科学学院、全球人文研究院主办的“全球南方推想文学——文化叙事、未来想象与世界文学重构”研讨会上，20余位来自比较文学、科幻研究、数字人文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有关话题。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副院长都岚岚认为，全球南方是重新思考全球秩序、发展范式与文明关系的重要视角。面对各类现实挑战，全球南方推想文学的价值是思考人类如何化解科技伦理危机、重构人与万物关系、建构未来理想社会。“我们将始终延续对推想文学的探索，打破科幻、奇幻等文类边界，将研究视野投向全球南方，秉持跨学科、跨文化理念，推动深化文明互鉴，以文学想象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”

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霍盛亚从拉丁语词根“spec”（观看）出发，建立了幽灵、奇观、思辨、投机、推想的五维批评框架，为全球南方推想小说提供知识政治视角下的分析工具。他表示，推想小说与全球南方具有结构性亲缘关系，二者均具有边界流动性特征。这五个维度共同具有“可见与不可见”的认知内核，形成叙事的批判力量。他谈到，全球南方是跨大陆的想象共同体，推想小说则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精神共同体，有助于建立正视南方历史传统、倾听南方多元声音、尊重南方知识体系的公正秩序。

科幻叙事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叙事蓝本，深刻影响大众对未来科技的认知与想象。西交利物浦大学副教授刘希谈到，以陈楸帆的《荒潮》《洄海》为代表的中国科幻小说，将岛屿从边缘地带变为审视全球危机的核心场域，构成独特的“城市—岛屿二重奏”。两部小说用科幻想象表达复杂的气候生态议题，将技术、资本、权力、性别、种族等议题编织于一体，并从书写“如何反抗”走向反思“如何共存”。“与前代科幻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，当代青年科幻作家开始审视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复杂位置，拒绝复制旧有的霸权逻辑，秉持共生与对话的发展理念，更新了科幻创作与科技人文研究的认识论基础。”

“青年科幻作家关注近未来，以现实生活的象征化、寓言化书写平凡人物如何在微末生活中表现富有生命光泽的诗意。”杭州师范大学教授詹玲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科幻青春叙事的脉络，认为当下科幻小说的成长趋势有三大特点：内心化、整体性和日常化。“我们能看到相当一部分小说将视角从外部世界转向人物内心，以自我感知凸显人的主观能动性，进而建构一种与技术物共存的新主体意识。”这样的写作为厘清科技与人文之间的辩证关系、探索新科技时代的文学发展路径提供了富有新意的视角，也推动中国科幻不断汲取传统文学的创作经验，持续提升自身的文学性与思想性。

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，使人类不断直面机器人带来的种种挑战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程林认为，有别于欧美焦虑型与日本愿景式的机器人文化逻辑，中国正在逐步形成务实理性、积极协同、人机共生的机器人文化内核。自古及今，从《列子·汤问》的“偃师造人”到当代科幻机器人题材创作，中国的机器人叙事始终带有两性平等、人文关怀和家国情怀的创作底色。他谈到，未来应当持续深挖传统文化意象，开拓独具民族文化特质的科幻叙事模式，推动建立全球机器人文化多元共生的发展格局。

“海洋”这一意象，也是此次与会专家学者提及的高频词汇。大家从气候与海洋生态建构、推想文学与大航海叙事谱系、“碳”的能源政治与劳动身份、海洋贸易与全球南方格局等角度，探讨了全球南方视域下东南亚、拉丁美洲等地推想文学研究的诸多新特征。正如复旦大学副教授吕广钊所言，海洋的本质在于流动、开放和未完成性，而这恰恰对应全球南方的核心特质：并非一种固化的地理范畴，而是全球结构中具有鲜明的位置与价值立场。

“中国科幻的想象与书写，为全球南方推想文学贡献了独特的东方智慧——以和平、对话、多元共生的价值理念，重新定义人类如何走向未来。”与会专家学者表示，推想文学不再是欧美国家专属的未来叙事，而是全球南方实现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的重要载体。在全球格局变革的当下，打破西方对未来定义权的垄断，让多元文明、边缘经验、生态智慧进入未来想象，既是文学研究的使命，也是人类应对共同危机的思想储备。未来，学界应当持续深化全球南方与推想文学的交叉研究，立足本土经验，吸纳跨文化资源，以开放动态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文学研究的边界，为构建多元共生的全球知识体系贡献力量。



立足全球南方立场，重塑多元共生想象

□与 尘

才15岁的样子……我跟他谈话以后，对于他前途的发展觉得不是那么乐观……我问他几个量子力学的问题，他都那么回答，但我问他：‘这些量子力学问题，哪一个你觉得是妙的？’然而他却讲不出来。对他讲起来，整个量子力学就像是茫茫一片。我对于他的看法是：尽管他吸收了很多东西，可是他并没有发展成一个taste。”可见，杨振宁所说的“taste”不仅指的是学术品味、治学审美、知识鉴赏力，更涉及“元认知”问题，也即一个人如何认知自己。

古希腊哲人说，人要“认识你自己”。实际上，这恰恰是当前教育中非常棘手的问题。一个年轻人要如何建立起对自己的认知和理解，如何在此基础上去做人生选择，这是很重要的人生课题。我认为，“科技人文写作”可以成为思考和回应这些问题的路径之一。它要求学生直面那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，直面那些无法用对错衡量、也无法用实验验证的复杂情境：一个人为什么做出这个选择而非那个？一项新技术的出现对某些人是解放，对另一些人又意味着什么？历史中被遗忘的声音，如何能被重新讲述？好的科技人文写作应当不断追问当世界被科技改造成另一番模样，人还是人吗？科技改变了什么，又留下了什么？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。而提出这些问题本身，就是一种人文的姿态。

（作者系科幻作家，西安交通大学中文系主任）